

王 亞 南 著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經濟形态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王 亞 南 著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經濟形态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2 022 0275 8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经济形态研究**

王亚南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3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13 • 插页2 • 字数295,000

1957年1月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7)1.40元

统一书号4001 • 222

封面设计者：王斌九 校对者：高振超等



增訂版序言

本書原名“中國經濟原論”，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由中國經濟科學出版社在福建發行。新版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改由上海生活書店印行。解放後，由三聯書店發行第三版，作為解放後的第一版。一九五一年四月又印解放後第二版。所以，就出版的全過程講，現在這個版本，就算是第五版了。

第二版對第一版沒有什麼重要的變更；第三版對第二版，也止於在解放後新版序言中，就全書的內容，提出了三個需要自我批判揭露的缺點，但並不曾把它糾正改造過來。這個版本，大体上可以說是對於那個認識的實踐。雖然訂正的地方能否完全補救原來的缺點，還是頗有問題的。

首先，我認為“中國經濟原論”這個書名，對它所研究的對象或內容來說，是有些含糊籠統的。如其說在反動統治下出版的當時，不含糊籠統是不行的，今天就有必要顧名思義地明確限定它的範圍。日文譯本題稱為“半殖民地經濟論”，那就今天日本的社会經濟來說，也許有較大的現實意義和啓發意義。但半殖民地經濟是把早在解體中的封建生產關係作為它的基礎，而我們現代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鬥爭任務，也正好是針對着這種社会經濟形態的。因此，我覺得，把書名改稱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就不但就內容上講是妥當的，並且還在今天世界反殖民主義的高潮中，被

賦予了新的現實意義。

其次，為了在尽可能範圍內，改正我在解放後新版序言中提到的三個缺點，我把原書第一篇全面改寫過了。原書最大的缺點之一，就是不曾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全輪廓，它的歷史，它的特點，扼要地敘述出來，以為後面立論的張本，這是唯物史觀地處理問題的基本要求，我在前沒有這樣作，現在在第一篇第一章中專講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企圖借此把原來表現在方法論上的缺點改正過來；原書的第二個大缺點，就是對於當時圍繞着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展開的論戰，雖然隱約地觸到了思想上的兩條戰綫，可是第一，沒有很明確地把那種論戰和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實踐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第二，沒有把當時革命陣綫方面的毛主席的指導理論，在適當的場合指明出來；第三，沒有把買辦經濟學者們反對中國社會改革並一味為封建買辦官僚統治階級辯護的各種謬論加以揭露；特別是第四，沒有好好處理孫中山先生的主觀社會主義思想，往往為了故意轉移視線，對民生主義作了一些不妥當的渲染，這樣，就不但有些混淆視聽，並还把中山先生的本來面目弄模糊了。對於所有這些值得檢點的錯誤，都分別有所改正。至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於有的同志曾經直接間接表示過不同的意見，以為寫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濟形態，採用以商品開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論述程序，似乎不妥。但一方面因為我的學力限制，還想不出一個適合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研究體系，同時也因為在採用這個論述程序的过程中，並不會怎樣感到論證不易發展，所以，關於這一點，一時還不能有很好的交代。一個已經大体定型了的著作物，是極易叫作者安於惰性的。

原書正文共八篇，講到中國社會的經濟恐慌形態為止；在解放

之初，我又就抗战結束前后十来年間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走上絕路的全运动过程，加以綜合研究，写出“旧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諸經濟傾向的总考察”，作为解放后新版的一个附論。在这次整理校訂当中，我觉得許多同志主張把这篇作为結論的意見，是值得采納的。在第一篇导論中，講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形成發展过程及其研究上的兩条陣綫，而在最后第九篇結論中講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下的各种經濟傾向的总考察”，这样，全書的結構，便像完整了一些。

再次，我要談到本書附論的問題了。

第一版原有五篇附論，即“中国商業資本論”，“中国商業資本与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中国公經濟研究”，“政治經濟学在中国”，“中国經濟学界的奧大利学派的經濟学”。我个人是比較重視这几篇附論的。而印第三版时，我尊重三联編輯部同志的意見，把后三篇取消了，“中国公經濟研究”那篇的論点，还有些欠斟酌，我觉得不附进去也好；但“政治經濟学在中国”和“中国經濟学界的奧大利学派經濟学”，是中国資產階級經濟学者研究中国經濟的理論張本，那在目前，也許还有不少的现实意义；那多少可以帮助讀者了解那些經濟学者在抗战前后發表的許多为統治階級辯护的“高見”，究竟是依据怎样的思想方法写出来的。除了这四篇外，我还把一九四七年为上海文匯報写的一篇題称为“中国官僚資本之理論分析”的文章，也作为附論，放在最后面，那应当可以补充我在“中国社会的資本形态”中，对官僚資本这个突出的形态沒有給予足够的篇幅来加以分析的缺憾。

全書經過了这一次的再組織和增訂，那篇解放后的新版序言

就成为不必要了。

在最近，本書的日譯本上冊已寄到我手里，那是在日本的进步人士組織的中国經濟研究会的指导下翻譯的，他們在进行翻譯的时候，要我写一篇序文，我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論壇上展开的关于日本社会性質再認識的論爭的情况，極善意的提出了我的看法。我根据我們長期遭受帝国主义統治的體驗和在本書中的理論分析，認為日本今日的社会經濟性質的討論，离开了美国帝国主义正在从各方面把它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殘酷现实，就是不实际的。他們非常同意我这个看法。所以，我把这篇序言附在这里，看一个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究同一个半封建国家变成一羣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显出了那样一些共同点和不同的特点。

全書的基本論点，是运用“資本論”中有关資本主义經濟和前資本主义經濟的原理和規律来展开說明的，但在解放以前，为了規避反动統治檢查的麻煩，多半是分別用經濟科学或偉大的經濟科學家指示我們一类語法，来表明它們是出自“資本論”或卡尔·馬克思的教导。关于这点，我覺得只須概括地指明一下就可以，不必要逐一改正过来。此外，有几处引用的材料，只提到某人在某書某杂志論文中如何講法，沒有把出版物的版本頁数詳注出来，一时又不易查出，这是准备随后查明补正的。

这个增訂本在校訂修正过程中，得到厦門大学陈可焜同志不少的助力，特此志謝。本書虽然經過这次修訂，仍恐有不少錯誤缺点，我是竭誠希望得到專家同志們的教正的。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譯本序言

一

這部書的主要目的，是企圖把帝國主義支配下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整體作為對象，來揭露其內部的矛盾及其向着毀滅之路邁進的辯證發展規律。臨到解放的前夜，作為帝國主義及買辦官僚統治的基地的農村，已經依着那種辯證發展規律，演成了全面崩潰的破局。

中國新政權成立之始，即沒收買辦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沒收封建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而合法的私人商工業，則受到保護。新的經濟條件和環境，使原來存在並作用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情況下的諸般傾向和規律，完全歸於無效了。結局在這種限度內，“中國經濟原論”這種性質的著作，就好像要成為舊時買辦封建經濟的“殉葬品”，雖然它在舊經濟的研究上，在新舊經濟思想鬥爭過程的鑽研上，乃至在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相結合的方法論上，還具有一定的歷史的現實的意義。

二

值得提到的是，這部書在寫作過程中，是多少受了日本經濟學界，特別是受了日本在第二次大戰前，由勞農派與講座派展開的關

于日本資本主義性質論戰的影響的，現在它獲得了被介紹到日本的光榮，那除了增益我們兩國文化交流的意義外，對於日本人民大眾脫出當前被奴役的處境，也許多少可以提供有益於革命實踐的若干看法。

第一，舊中國經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點，是從它被帝國主義勢力侵入的那天起，就逐漸形成的。帝國主義通過中國的封建買辦官僚統治支配了控制了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很快就將原有那些不利於它的因素，如有礙製品暢銷的舊式手工業，家庭副業等，給排除分解掉，而使那些有利於它的因素，如供給原料半製品的舊型生產作業，舊的採購組織乃至舊金融機構，給改裝變形地保留下來。就因為這個緣故，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社會經濟形態才能形成，它的特殊運動規律才能為我們所研究和把握。然而，

第二，正由於各色帝國主義者是通过中國的封建買辦官僚對中國人民大眾行使間接的統治，並且所有這些國內國外的統治階層，又基本上只是靠着農村的封建榨取作為其寄生的營養，結局，存在於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下的任何具有現代組織規模的商工業乃至金融業，都變質為帶有前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東西，如其我們理解到：那怕是同樣規模的小生產組織或商業組織，在一個典型資本主義國家，那就比之在一個封建國家，帶有更大資本主義性格，反過來，則又會帶有更大的前資本主義的性格。在我們原來的舊經濟中，誰也承認有一些新的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但根據我們的經驗和我在本書中的分析，它們都分別改形變質地捺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一個社會經濟形態里面的各種經濟範疇，只顯示為是它那個整體中的各個別側面。

第三，為了更好認識那個社會經濟形態的特質，從歷史上去探

究那各个別經濟范畴的面貌，原不是沒有益处，如大革命后的中國社会史論战，曾大有助于此后中國社会性質論战，但如沒有好好把握着当面的现实的社会經濟主体来探究其各別構成部門在那里面所显示的作用，而用过多的時間，糾纏在它原来的历史性格的究明上，那就显得不很实际，而且距离原来希望从历史上来探究我們当前社会性質的意圖，就太远了。在过去，我們确曾走过这样的弯路，离开当面帝国主义統治我們的现实，离开整个封建农村破产的现实，而在所謂亞細亞生产方式特殊制以及小农經濟等等方面的斷斷爭論，費去了太多的時間，我的意思是說，如其帝国主义通过封建买办官僚来統治我們既已成为不可爭辯的事实，我們就不妨多注意那种經濟形态下的各种政治經濟組織必然会發生的作用，而毋庸太斤斤于其历史性格可能引起的变化。这教訓，也許有所益助于我們日本人民大众的思想战斗任务罢。

三

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变化是太多也太大了。由一向在飢餓死亡綫上掙扎的农村底層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都在不穩定的状态中。几年大战的瘡伤和战后殖民地及海外可以直接間接控制的市場及原料供給地的喪失，把日本資本主义先天不足的性格，更加赤裸裸地暴露無遺了。劳动大众进一步陷在水深火热中；中小有产者連同自由職業的知識阶層都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沒落的命运前战慄；即使是独占的大資產階級吧，虽然他們对于抓紧机会，医治瘡伤，并未表示消極，但大势所趋，总会感到躺在火山頂上，究不怎么安逸啊！一句話，被統治者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統治者也就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統治下去。这就是全面的深刻的延

續的总危机。

“怎么办？”“往那里去？”

对于这样的问题，日本人民有一个答案，日本統治者有另一个答案；人民大众說：“我們不能再繼續被磨折，被欺騙，被帶上毁灭的道路，踢开那些行使狂妄野蛮統治的混蛋！我們自己来干！”而統治階級在人民大众势力高漲而同时又有外力可借的时候，总是采取“宁与胡虜，不給家奴”的策略；他們会毫不羞赧地表示：“我們乐意接受美国人的統治，美国人也乐意維持我們的統治”。他們已經用行动这样表示出来了。

这就是今天日本面临着的最冷酷的现实。它已經由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国家，轉落成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它的整个社会經濟形态問題，要从这里出發来考察。征服者对于被統治国家的原来生产方式是会考虑的，威廉征服者曾考虑原来英国人的生产方式，日耳曼征服者曾考虑羅馬人的生产方式，蒙古及清朝征服者曾分別考虑宋明时代的中国生产方式，但所有古今征服者要考虑这种問題，并不是从被統治者的利益出發，而是从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而是从他們要怎样才便于压制，便于奴役，便于搜括，必要时，还便于驅使劳动人民去为他們的利益而战斗出發。日本的天皇制度，日本在長期軍国主义教育下培养的国民体格和紀律訓練，日本独占資本的軍需性格，日本农村的封建剝削……所有这些因素，美帝国主义都会依照它的統治需要来安排編組在它所希望实现的政治經濟形态中。不錯，日本曾經是一个有了相当基础的資本主义——帝國主义国家，日本人的自尊心，不会容許美国統治者为所欲为地作去，然而，占領制度，軍事基地，美日安全条约……不正还在發揮着“鞭子，圈套和絞索”的作用么？

日本經濟学界所要研究的日本的社会經濟对象，就只能是美

國統治者套好繩，揚起鞭子所要加速驅策編組成的東西，在目前正在形成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凡屬過去體現出日本資本主義的落后性那一面的因素，如零碎耕作的封建佃農制，如包含着各種非常殘酷剝削慣例的產業勞動條件，如由天皇制引出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設施……顯然都會變本加厲地保留下來，而使那些現代性的社會經濟組織，都相應帶有前資本主義的性格。

由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變成半封建的保護國，那和由一個封建的落后國家變成半封建的半殖民地，其所經歷的過程當然不同，其所表現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也當然不能一樣。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前者包含有更不自然的更複雜的更強烈得多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就是在反動的大資本家大地主及貴族官僚軍閥一極，更依靠美帝國主義，更加强維持統治的軍事政治機構，更法西斯化，更加重對於勞動人民的壓迫與剝削；而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中下資產者自由職業階級的一極，則顯然要把他們的窮困圈擴大加深。兩方面互為因果的作用着，就使這種矛盾發展成自我否定的辯證規律，而在其中所反映的階級的向背和消長變化狀況的說明，就成為現階段日本民族解放民主革命鬥爭的理論基礎。

四

在中國，現在還不易經常得到日本進步出版界的刊物，從小山弘健氏編著的“日本資本主義論爭史”下冊中，我翻閱到了書末附載的由一九四五——一九五三年的戰后論爭文獻目錄，發現關於國家體制問題，農業問題，資本主義性質及其在現階段的再建問題，幕末——維新史問題以及國家獨占資本主義問題等方面，都有許多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論著。我沒有機會接觸到那些論著的原

文，从小山氏在那本書里面的概括叙述，不难想見大家都是要为日本当前的厄运，找出一条比較可以行得通的出路。但根据中國在抗战前的論爭經驗，結合到上面的有关中國在旧社会經濟的說明，我想为日本今天的政治經濟問題的論爭，提出以次几点參考的意見：

(一)日本現正为美國帝國主义所統治着奴役着。丟开这个前提事实，任何方面任何性質的討論，都会不切实际。

(二)在美帝國主义者正行使統治和奴役的限內，日本原有的社会政治經濟組織，不管是“神聖的”天皇制，还是“微賤的”小佃农制；也不管是現代型的大企業，抑还是帶有原始性的手工的家內的作業，更不管是从幕末——維新時代就傳演下来的老經營，抑还是由第二次大战結束才出現的新組織，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由征服者統治者美帝國主义加以适合于它的占領和奴役的意圖的編組；如其說有什么特殊，那至多也不过是由一个資本主义——帝國主义國家变成另一个資本主义——帝國主义國家殖民地保护國的特殊。所以

(三)資本主义再建的問題，农村改革的問題以至天皇制的存廢的問題……等等，都同美帝國主义者对它們所抱的态度或直接或间接在何种程度予以利用的打算有关；也就是說，都要同反对美帝國主义及其日本的代理人統治發生密切联系。只有把那些再建，改造或撤除傳統障礙問題，当作反对美帝國主义及其傀儡統治的一个具体斗争內容，才有其现实的意义。

(四)对于当前的乃至历史的政治經濟問題的研究，显然都是为了更进一步弄明白：在民族解放民主改革斗争中，社会各階級从它各別不同的經濟地位出發，究竟会采取那种态度。这种“特殊”殖民地社会經濟中包含的内部矛盾，究竟会怎样变化，会怎样去

影响那些阶级的势力的消长及其对于解放改革事业所抱的态度。

五

最后，我得说明，我把我的这种不成熟的意见，附在拙著“中国经济原论”的日译本序言中写出来，是希望借此表达我对于日本人民当前解放事业的极度关怀，同时也企望由此对拙著“中国经济原论”添加一些现实的意义。我相信，日本社会经济学界的大家和朋友们，是一定会原谅我并予以指正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

初版序言

現在拿来与讀者見面的这部書——“中国經濟原論”，就写作与出版的过程說，都算是相当难产。

一九四〇年我在国立中山大学担任高等經濟学这一門課程；顧名思义，当然需要講得高深一点。我于是选定里嘉圖（David Ricardo）所著“經濟学及賦稅之原理”作为講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許因为同学原来所学基础太差，一半也許因为我自己解說表达的能力不够，我發現同学对于这門課程感到十分兴趣的并不很多。就在同时，我还担任有中国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这两門課程。讀中国經濟史的是四年級的同学，讀高等經濟学的亦是四年級的同学。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講，我相信我講里嘉圖的經濟学說，还应比講中国經濟史有較大的把握，但同学对后者表示的兴趣，却远較前者为大。我当时就感到，这原因，不当完全求之于里嘉圖那部大著的难讀难講（以謙虛見称的里嘉圖，当他把那部書拿去問世的时候，他竟表示：全英国是不是会有二十五个人懂得），而更应追問到：中国一般研究經濟学的青年学子，在作为一个中国的經濟学研究者限內，他是否有理解这样抽象的理論之必要，或者至少，他們所研究的抽象理論，是否能拿来同现实，特别是中国經濟现实發生認識上的关联。由于这一种感想，我对于中国大学講壇上，关于經濟学以及一切有关經濟学課程所采取的教材与教法，就感到大

有改革之必要。我当时所写的，而放在本書后面作为附論的“政治經濟学在中国”一文，正是那种意念的具体表現。

在一九四二年，我还是担任高等經濟学，还是把里嘉圖的經濟学作为底本，不过，每講一章，比如講价值論或地租論，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結論，拿來說明中国的商品价值，中国的地租，如何非里嘉圖所研究的范畴，或者，里嘉圖所研究的經濟范畴，如何可以从反面来証示中国社会經濟的非資本主义性。这个講法，馬上使一般同学發生兴趣了。研究經濟学或者研究什么經濟理論，本来是为了拿来作为理解或研究现实經濟的手段，但一般却像行所無事的把这种意思弄錯了。

在以后几年——一九四二、四三、四四年——中，我不但在講高等經濟学的时候，丢开了里嘉圖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經濟理論，尙論到中国經濟，即分別由价值論展开中国商品价值的研究，由利潤利息論展开中国利潤利息形态的研究，并还把經濟学一門功課也担任起来，編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場来研究經濟学的政治經濟学教程綱要，在講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經濟形态之后，紧接着就講到中国有关經濟形态的相同相異点，以及时下流行的国人有关那种經濟形态的不正确認識，并分別予以評正。

本来，在高等經濟学講述的过程中，为了这样的講法，这样的研究法，是一种新的嘗試，需要分別把它撰述出来，就正于海內的高明，所以，本書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別發表于“中山文化季刊”、“广东省銀行季刊”、“时代中国”等杂志。在一九四四年初，承桂林文化供应社主持人万民一、万仲文昆季的友誼与盛意，使这先后依照一定計劃写成，但却是分別發表的諸論文，得有集印的机会，于是我曾就中国現代經濟的全般發展情形，及中外学者对于中

国經濟本身認識的演变情形，写了一篇长达三万余言的緒論，作为第一篇，而全書則題称为“中国經濟原論”。但事不湊巧，“原論”的紙版剛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在这以后不久，我亦由国立中山大学的所在地广东坪石播迁到福建来。永安东南出版社計劃印行“大学学术叢書”，希望我把原来交給文化供应社印行，但却未出版的这部書稿，拿来再印，我当时曾函文化供应社的負責人商談，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沒有回响。我当时設想，为了文化的意义，另行在东南印行，一定能邀得朋友的諒解。况該書的紙版是否搶出还有問題，于是我决計整理旧稿，交由东南出版社印行。但在整理的开始，就發現作为緒論的第一篇原稿遺失了；不久，东南出版社突然因为一陣政治風波，把負責人吹得散逸無踪了。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直等到有志于中国經濟之科学研究的朋友們，組織了經濟科学出版社，并希望我首先把这部書稿提供出来，我这才重新鼓起勇气，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範圍內，对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訂。

后面增附的五篇，其中，“中国商業資本論”、“中国商業資本与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因为可以帮助理解中国資本形态，所以从拙著“中国經濟論叢”中移植过来；“政治經濟学在中国”、“中国經濟学界的奧大利学派經濟学”，因为可以帮助我們理解一般人对中国經濟認識的錯誤，所以也从拙著“經濟科学論叢”中移植过来。至“原論”全書所論究的各种經濟形态，大体是就私經濟立論的，对于有关中国財政方面的情形，沒有直接明显述及。这就“原論”所研究的範圍來講，虽不一定是什麼缺陷，但探究中国經濟运动的整體，显然是不能忽視这方面的直接間接作用的。

本書是嘗試把中国經濟全体，当作被若干重要經濟法則所貫